

明中葉廣東禁毀淫祠寺觀與寺田處理

任建敏*

明代中葉廣東毀淫祠活動及其影響是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本文從寺田賦役角度出發，揭示明中葉廣東禁毀淫祠寺觀前後寺田性質及賦役情況的變化，以及潛藏在毀淫祠旗號下廣東地方官府與權勢之家的利益爭奪。魏校毀淫祠寺觀行動以後，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控制大量田土的寺院大大減少了，但寺院釋放出來的田土仍然保持寺田性質，並沒有轉變為一般民田。寺田的糧差與一般民田不同，官府在寺田出售以後，仍然對寺田有一定處置權。即使買主購買這些寺田時已經交納了田價，官府仍然能夠通過繳納軍餉、興辦大工等名義增價發賣。對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而言，嘉靖年間是廣東寺田轉變的關鍵時期，魏校毀淫祠只是這個轉變的起點，隨後引發的嘉靖初年對淫祠寺觀田產歸屬的爭論，以及嘉靖中期對寺田田價及糧差的進一步處置，改變了廣東「寺田」這一特殊田產的性質及賦役政策。

關鍵詞：廣東、毀淫祠、寺田、糧差、增價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明代中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方的毀淫祠活動及其社會影響，是研究者十分關注的問題。已有研究大多從禮儀變革的角度來探討這一社會變遷。科大衛(David Faure)、劉志偉等學者的研究，揭示了明中葉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族興起的歷史。一方面，士大夫透過禮儀的方式創建宗族，另一方面，士大夫又打出「辟邪崇正」的旗號，大毀「淫祠」，爭奪佛道及民間信仰的空間。在明中葉前後一、兩百年間，珠江三角洲寺觀林立的景象逐漸變成了祠堂遍佈的景象。¹已有研究雖然指出在這一過程中，淫祠寺觀所控制的大量田土被官府變賣，落入官府以及地方權勢之家的手中，但並沒有進一步考慮這些田土的性質以及由此引發的明中葉廣東地方賦役結構的變化。

所謂淫祠，是指「與朝廷所編纂的祭祀典籍(祀典)裡所記載的祠廟，即與通稱的正祠不同，未被祀典登錄的祠廟」。²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官員會根據其需要來定義當地的寺觀庵堂是否屬於淫祠。在唐宋以前，史籍中就已經偶有朝廷或者地方官員打擊地方淫祠的記載。佛寺嚴格來說不屬於淫祠，中古時期，上至宮廷下到民間，佛教與道教的影響力之大，恐怕要讓當時的儒家相形見绌。宋代理學的興起，理學家要讓自己的學說為朝廷認可，為民間信服，更要宣揚辟佛老、崇正學。到了明代中期，在理學與科舉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士大夫群體，掀

¹ 代表性研究例如科大衛，〈國家與禮儀——宋至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頁 65-72；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頁 3-14；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頁 54-64；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頁 1-20。

²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廣東民間信仰與儒教〉，頁 41。

起了一股「近乎異常的復興正統教學的活動」。³這股潮流大致從弘治延伸到萬曆，而以正德、嘉靖兩朝最為突出。毀淫祠不僅是儒學與佛老以及民間信仰的較量，還關乎這些「淫祠」，尤其是寺院背後龐大田產的爭奪。科大衛、井上徹等學者都曾就嘉靖初年廣東提學副使魏校(1483-1543)大毀淫祠進行了專門的探討。科大衛把魏校毀淫祠放到珠江三角洲地區禮儀與民間信仰發展的歷史脈絡中探討；而井上徹則具體考察魏校政策的內容及廣東社會的反應。⁴本文認為，明中葉珠江三角洲的禁毀活動，其目的不僅僅在於打擊「淫祠」背後的民間信仰或神靈崇拜，更重要的是打擊珠江三角洲根基深厚的佛教力量，關鍵措施是剝奪寺院的田產。正如萬曆《新會縣志》對這件事的描述，是「督學魏校大毀淫祠寺觀」，而並不僅僅只毀「淫祠」。⁵在禁毀淫祠的名義下，大量佛寺在這個過程中遭受打擊，寺院被拆毀，寺田被發賣。佛寺所擁有的田產，成為當時廣東地方官府與珠江三角洲地方勢家爭奪的焦點，這些田產除了一部分作為官府的官學、社學或官方祠廟的公項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被地方的權勢之家所承買。既有的研究雖然注意到田產問題，但是沒有重視寺田的特殊性。

3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 42。關於明清時期淫祠問題的研究可參羅東陽，〈從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權與民間社會〉一文，羅列小島毅、科大衛、井上徹、趙世瑜、濱島敦俊等人的代表性文章。見羅東陽，〈從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權與民間社會〉，頁 131。

4 科大衛，〈明嘉靖初年廣東提學魏校毀「淫祠」之前因後果及其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頁 129-134；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 41-51。

5 王命璿修，《(萬曆)新會縣志》，卷 1，〈縣紀〉，頁 23。《(康熙)新會縣志》該條改為「毀淫祠、興社學」其強調的重點又有所不同了。見賈洛英修，《(康熙)新會縣志》，卷 2，〈事紀〉，頁 416。

二、明初寺田賦役原則與廣東佛寺田產規模

佛教在中古時期的影響力之巨大，學界早已有共識。延及宋元，佛教仍然在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佛教所擁有的特權不再像中古時期那樣優厚。竺沙雅章指出，元朝最初是免除寺院的徭役和稅糧的，直到大德年間開始，寺院的特權逐漸減少，但主要還是針對擁有豐富財產的江南寺觀在元代續置的田土。⁶從廣東的情況來看，元代對寺院特權的限制並不只局限於江南，廣東地區大概也在限制之列。潮州府淨慧寺在後至元六年(1340)的碑記提到，當時有蕭姓施主施地 60 畝後，就從原戶「過割段立淨慧寺戶名，於本保應當差稅」。⁷可見轉入淨慧寺的田產，不僅要納糧，也要應差。也許元朝前期對佛寺的賦稅徵收是相當優待的，但中後期之後開始削減佛寺的特權。

明代的寺田，根據其性質可以劃分為賞賜田、廢寺田與常住田三大類。這三類寺田的田土性質與賦役政策又各有不同。

關於三類寺田的性質問題，《明史》認為，明代田土制度有二等，其一曰官田，其二曰民田。梁方仲為《明史·食貨志》所作箋證指出：官田與民田以所有權來劃分，在官者曰官田，在民者則曰民田。不過梁方仲也承認，明代蘇、松、嘉、湖等府的官田，實際上與民田無異，他們並非官產，只是科則有輕重不同。⁸《明史·食貨志》認為，賞賜莊田、廢寺田屬於官田。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十

6 竺沙雅章，〈明代寺田の賦役について〉，頁 490-491。

7 後至元六年〈湖山淨慧禪寺田產題記〉，收入譚棟華等編著，《廣東碑刻集》，頁 241。

8 梁方仲，〈《明史·食貨志》第一卷箋證(續三)〉，頁 71。

一月「覈天下廢寺田產，沒入官」。⁹可見將廢寺田視為官田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寺院所有的常住田，在〈食貨志〉中並未列明屬於官田還是民田。梁方仲據《古今治平略·國朝田賦》指出，民田有新開、沙塞、寺觀田三種，認為寺院所有的常住田屬於民田的一種。¹⁰但常住田的性質與一般民田不同，如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下令「天下僧道常住田不許典賣」，¹¹而一般民田就不會有這種規定。因此，從所有權來看欽賜田、廢寺田二類寺田屬於官田，而常住田則屬於民田。

關於三類寺田的賦役問題，竺沙雅章、傅貴九以及林楓等人都有相關研究。這些研究主要依據明代官方詔令、地方志、寺觀志等材料考察明初寺院的納糧當差、砧基道人、招佃收租、寺田充餉等問題，主要關注區域是江南與福建，基本未涉及廣東的寺田情況，而且沒有進一步區別三類寺田的具體情況。¹²據洪武二十四年(1391)頒行的攢造黃冊格式規定：「凡庵觀寺院，已給度牒僧道，如有田糧者，編入黃冊，與里甲納糧當差。於戶下開寫一戶，某寺院庵觀某僧某道，當幾年里長、甲首。無田糧者編入帶管畸零下作數。」¹³此處所提及的僧道田，應該指常住田，由此可見，明太祖初造黃冊時，並沒有給僧道特權，其常住田是編入一般里甲之內納糧當差的。竺沙雅章認為，僧人同樣要編入里甲，一體納糧當差，是明初對寺田賦役最引人注目的改變。¹⁴不過問題是，這一詔令與實際情況似乎並不完全相符，寺田雖然有稅糧，但並無差役。如《金陵梵剎志》記載，明太祖對南京的

⁹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卷 140，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壬辰條，頁 2202。

¹⁰ 梁方仲，〈《明史·食貨志》第一卷箋證(續三)〉，頁 79。

¹¹ 李東陽等纂，《(正德)大明會典》，卷 19，〈戶部〉，頁 233。

¹² 竺沙雅章，〈明代寺田の賦役について〉，頁 487-512；傅貴九，〈明清寺田淺析〉，頁 20-28、35；林楓，〈福建寺田充餉淺析〉，頁 48-53。

¹³ 李東陽等纂，《(正德)大明會典》，卷 21，〈戶部〉，頁 255-256。

¹⁴ 竺沙雅章，〈明代寺田の賦役について〉，頁 489。

幾個大寺院賞賜田土，並且「免他夫差」。¹⁵又洪武二十七年(1394)〈禮部條例〉規定：「一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充當差役。」¹⁶該〈禮部條例〉並未見於現存明代典章中，但傅貴九提到，《明宣宗實錄》記載宣德八年(1433)廣東按察司奏稱：「今廣東、浙江、江西等處寺觀田地，多在鄰近州縣，頃畝動以萬計，謂之寄莊，止納秋糧，別無科差。」此外，《金陵梵剎志》記錄南京天界寺僧曾將投寄民田「一概朦朧作寺田，冒免雜差」，¹⁷也與〈禮部條例〉「雖有稅糧，仍免雜派」的說法相符。由此看來，欽賜田地是不需承擔差役的，且該條例又宣稱這些欽賜田地連稅糧也全免。至於常住田，從該條例來看，雖然要交納稅糧，但是沒有雜派，僧人也不必充當差役。至於廢寺田，作為官田，大概也是只承擔較民田科則更重的官租，而同樣無需承擔差役。宣德七年(1432)朝廷還降例，明確「廢寺田地仍許度牒僧掌管」。¹⁸大致來看，明初對佛寺是一方面進行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則對寺院的田產採取優免。基本原則是：欽賜田土無稅糧、差役，自置常住田地以及官府所有的廢寺田都是有稅糧而無差役。

由於明初的政策規定寺田不需承擔差役，所以地主若將民田寄在寺院名下，對他們更加有利。從明初到成化年間，朝廷屢有詔令限制

¹⁵ 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頁457-458。《金陵梵剎志·欽錄集》記錄了大量明初有關佛教的聖旨，這些聖旨往往不見於明代官修政書，作者稱是出自「各大寺藏本」以及「荒碑故牒」，所以更多的是反映佛寺對明初這段歷史的敘述，不一定能準確反映明初的國家政策。

¹⁶ 據《金陵梵剎志》的記載，該條例之內容繼承自洪武二十四年(1391)〈申明佛教榜冊〉。參見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2，〈欽錄集〉，頁467。

¹⁷ 楊士奇等撰，《明宣宗實錄》，卷100，宣德八年三月甲寅條，頁2236；寅亮，《金陵梵剎志》，卷50，頁82。又參傅貴九，〈明清寺田淺析〉，頁23-25。

¹⁸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25，〈寺觀二〉，頁143。

寺觀的田土。如正統十三年(1448)，朝廷下令：

各處寺觀僧道，除洪武年間置買田土，其由續置者，令各州縣有司查照散還於民。若廢弛寺觀，遺下田莊，令各該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及丁多田少之民。每戶男子二十畝，三丁以上者，三十畝。若係官田，照依減輕則例，每畝改科正糧一斗，俱為官田。如有戶絕，仍撥給貧民，不許私自典賣。¹⁹

景泰三年(1452)又下令「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成化十六年(1480)再令「福建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每寺除徵糧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無田小民領種」。²⁰由以上數條來看，在朝廷眼中，寺田並非寺院的私產，國家有進一步的處置權。朝廷的目的是限制寺院田產的規模，把高出限額的田產交給「小民佃種納糧」。正統十三年(1448)的詔令提到，作為官田的廢寺田，以每畝正糧一斗起科，由貧民耕作，不得私自典賣。朝廷詔令的效果大概不是很顯著，否則不必三令五申。而且皇帝也往往尊崇佛教，如《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一年(1485)禮部尚書周洪謨(1421-1492)的陳奏提到：「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內外敕賜寺觀至六百三十九所，後復增建，以致西山等處相望不絕，自古佛寺之多未有過於此時者。」²¹此言雖然有誇大之嫌，但也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

由此可見，洪武二十四年寺田需要納糧當差的詔令，並不是一個延續下來的政策，正是由於明前期寺田擁有免差的特權，所以才會出現當時寺觀田產「動以萬計」的結果。竺沙雅章把僧人免差的情況一概視為「例外」，恐怕是有失偏頗的。²²

19 李東陽等纂，《(正德)大明會典》，卷 19，〈戶部〉，頁 234。

20 李東陽等纂，《(正德)大明會典》，卷 19，〈戶部〉，頁 234-235。

21 參見周齊，〈明朝諸帝的佛教認知與政治文化環境〉，頁 273-293。

22 竺沙雅章，〈明代寺田の賦役について〉，頁 495。

成化九年(1473)成書的《廣州志》，很能反映當時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佛教寺院田產之雄厚，現存成化《廣州志》殘本中，有整整三卷篇幅記載了廣州府各縣的寺觀及庵堂。方志的作者詳細的列出了這些寺觀的方位、建立時間、沿革歷史、田土情況和相關詩文。這在廣東現存大量方志中，是獨一無二的記載。可見方志作者對寺觀的重視，和嘉靖以後的珠江三角洲方志簡單羅列寺觀的情況大異其趣。其中，擁有最多田產者，是位於廣州城西北角的報恩光孝寺，成化《廣州志》記載該寺有田地山塘 486.99 頃，²³分佈在南海、番禺、新會、田山(疑為香山之誤)、東莞 5 縣。其次是位於廣州城西南的南華禪，有田 114.5 頃。而其餘的寺廟，較大的田產在 20 至 40 頃左右，較小的則在 1、2 頃之間。至於庵堂，多數只有田數畝到數十畝。這些田產紀錄來源不詳，也不清楚其所反映的時間，²⁴但成化《廣州志》既然登記了這些數字，表明這三卷的紀錄在當時是有意義的，也許是來自成化年間官府用來徵收寺田賦稅的簿冊紀錄。粗略統計，《廣州志》所記載南海縣轄區有田額數字的 52 所寺院，合計有田 1,048.6 頃。較小的道觀庵堂，登記的田額大約有 50 頃。總數約 1,100 頃(其中外縣寄莊田約有 500

²³ 1 頃等於 100 畝，傳統畝制以 240 步為一畝，但實際上土地登記中的畝制是十分複雜和混亂的，正如梁方仲所言，這些田畝數字與其視為田地面積，不如理解為稅地單位的數量。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頁 527-528。乾隆《光孝寺志》稱：「考光孝稅畝，載于南、番志乘者不下五十餘頃，當年食指萬數，南中梵宇，此為極盛，乃一壞於弘治間之分房，再壞於崇禎間之寇亂。」清乾隆時人看來，南、番志乘所記載的光孝寺田 50 餘頃的數字已經算是「極盛」的了，和《(成化)廣州志》的 400 餘頃的記錄相比差距非常大。顧光撰，《(乾隆)光孝寺志》，卷 5，〈淨業志〉，頁 121。

²⁴ 大部分情況下只會說明該寺有田地若干。但在一些寺院條目之下，會說明是「見管常住田」，如位於番禺縣的海珠慈度寺。見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5，〈寺觀二〉，頁 141。

頃)。²⁵而成化年間南海縣官民等地田地山塘總額是 29,603.12 頃。²⁶也就是說，僅僅是登記在冊的寺觀庵堂的田地，就占南海縣田額大約 3.8%(不計入外縣寄莊田的話，則是 2%)。這一數字是什麼概念呢？據嘉靖《廣州通志初藁》，廣州左、右、前三衛的屯田原額加起來不過 895 頃。²⁷還比不上南海一縣的寺院占田。新會縣的比例肯定要比南海縣更高，因為僅僅是報恩光孝寺在新會縣就有寄莊田 357.64 頃。²⁸嘉靖六年(1527)《廣州志》記載，新會縣成化八年(1472)有官民等項田地山塘 11,599.52 頃。²⁹即一個廣州光孝寺在新會的田產，就占了整個新會縣登記田地數字的 3%。加上其他寺觀以及新會本地的寺觀田產，新會縣的寺觀田產也許即占全縣田額的 10%。在成化《廣州志》的編者看來，這些寺觀大概不算「淫祠」，那些不被官方記錄下來的民間信仰場所，數目肯定更多，雖然單個的田產規模遠比不上大寺院，但是加起來總數卻也不少。

三、嘉靖初年圍繞被毀淫祠寺觀田產的爭論

明代士大夫與佛教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卜正民(Timothy Brook)討論明代士紳與佛教關係時認為，理學的興起是在「儒家哲學之外的領域向佛教權威挑戰」，由此「破壞了儒家文人和佛教機構之間的關係。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裂縫越來越大。理學和佛教之間的這種疏遠使明代知識人士感到左右為難」。³⁰同是儒家文人，對待佛教乃至民間

²⁵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4，〈寺觀一〉，頁 119。

²⁶ 黃佐修，《(嘉靖)廣州志》，卷 17，〈貢賦〉，頁 344。

²⁷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藁》，卷 29，〈屯田〉，頁 496。

²⁸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4，〈寺觀一〉，頁 118-140。

²⁹ 黃佐修，《(嘉靖)廣州志》，卷 17，〈貢賦〉，頁 344。

³⁰ 卜正民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頁 14。

風俗的態度是有很大分歧的。如何淑宜指出，明代很多士紳都會把《朱子家禮》作為「對抗社會習俗利器」，在喪葬中《家禮》與「不作佛事」如同對立不相容的兩套儀式。但與此同時，由於種種原因，士紳對佛道儀式採取模稜兩可態度的情況也十分常見。明代士紳的移風易俗活動「並非單純的灌輸一套單一的思想，而是企圖整合民間習尚，抽取出符合儒家禮儀的部分，用以推廣另一種儒家道德倫理，以教化庶人，改造社會」。³¹在這種模稜兩可的情況下，熟讀儒家經典的地方官員，是否要在其任上打擊佛道或者淫祀，是頗為自主的行為。正如羅東陽指出，「禁毀淫祠並不是官員們日常化的行政事務，而是帶有濃重理學理想色彩的行為」。³²

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區最早打擊寺觀的紀錄是在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廣州大毀寺觀」，當時「詔令天下郡縣止存寺觀一區，餘歸併為叢林」。³³可見確實有一些寺廟在這一詔令中被歸併到光孝寺、景泰寺等大寺之中，但多數都存續下來了。所以成化《廣州志》記錄下來的寺觀數量和規模仍然非常大。科大衛指出，從正德年間開始，「打擊淫祠的運動，被悄悄加入了打擊佛教的成分」。³⁴他也強調，「明代的反宗教運動，往往牽涉地方廟宇和佛寺兩方面。……然而，明代的官吏，並不是反對所有的宗教。……禁制巫覡是全面性的，反佛教是局部性的政策」。³⁵不過，在正德嘉靖之際，全面性的禁制巫覡與局部性的反佛教的毀淫祠在珠江三角洲合流了，其頂峰即是嘉靖初年

31 何淑宜，〈以禮化俗——晚明士紳的喪俗改革思想及其實踐〉，頁 49-100。

32 羅東陽，〈從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權與民間社會〉，頁 135。

33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藁〉，卷 3，〈政紀〉，頁 61。

34 科大衛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頁 120。

35 科大衛，〈明嘉靖初年廣東提學魏校毀「淫祠」之前因後果及其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頁 129。

廣東提學副使魏校所主持的毀淫祠寺觀活動。井上徹說：「在魏校實施搗毀淫祠政策前後，在當時的官界可以看出，搗毀淫祠的行動好像已成為一種時尚。」³⁶魏校的毀淫祠行動之所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引起巨大的反響，就是因為他的政策不僅打擊地方上的各色淫祠，而且將「毀淫祠」與毀寺觀緊密結合起來。魏校毀淫祠行動，一方面需要得到地方官員的執行，另一方面還要取得士紳之家的支持。這是因為地方士紳及其家族擁有地方事務上的話語權，如果地方士紳不配合，毀淫祠的行動很難在地方開展。雖然魏校預期淫祠寺觀都會改為書院社學，田產作為學田，但實際操作的空間相當大。毀淫祠寺觀所釋放出來的大量田土，需要招人承買，一般平民沒有能力承買這些田產，而地方的士紳之家與地方官府有著各種聯繫，可以很方便地獲得承買資格。在魏校擔任廣東提學副使的兩年，不少珠江三角洲士大夫在這一過程中透過各種方法，取得在魏校的政策中應該改為書院、社學等公共用途的大量寺觀基址及田產的所有權。正如嘉靖四年(1525)出任提督兩廣都御史的姚鏌(1465-1538)指出：「(寺觀)地土田塘等項，多被豪宗右族乘機強佔為業，或立作書院等項。」³⁷這些士大夫在處置他們所獲得的寺產時，往往將這些淫祠、寺觀改建為自己的書院或家族祠堂，而這些寺觀原有的田產，相應的也成為了這些書院及祠堂的產業。³⁸霍韜(1487-1540)、方獻夫(1485-1544)、湛若水(1466-1560)等當時廣東士大夫在

36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 42。井上徹是根據濱島敦俊之研究，見濱島敦俊，〈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頁 1325-1358；《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頁 158。

37 姚鏌，《東泉文集》，卷 8，〈督撫事宜〉，頁 748。

38 如霍韜所建立的大宗祠、四峰書院，方獻夫後人在廣州城西禪寺建立的文襄公祠。《石頭霍氏族譜》，卷 1，〈祠記〉，無頁碼；《南海丹桂方譜》，〈方譜祠墓・祠〉，無頁碼。

魏校毀淫祠中都會將被毀寺院改為書院或祠堂。³⁹其他補充例子，尚有黃佐(1490-1566)以景泰寺創建泰泉書院、黃衷以月溪寺建鐵橋精舍等。⁴⁰元明時期的羊城八景中，有一景名為「景泰僧歸」，指的是廣州城北白雲山的景泰寺。⁴¹景泰寺在洪武二十四年廣東大毀寺觀時沒有被牽連，反而成為官方認定的合法佛寺而得以壯大。⁴²雖然該寺赫赫有名，也無法在魏校毀淫祠運動中倖免。黃佐將景泰寺承買回來，改為泰泉書院。為此，黃佐還刻意改寫了景泰寺的歷史，不提景泰寺作為羊城八景的歷史，以及洪武朝時作為官方認定的廣州幾所大寺之一，而是將其塑造為一個妖僧煽亂、並無國家賜額的寺院：

白雲之半，永泰之泉出焉。……宋天禧間，有好事者以地在羅浮西麓，乃結茅其上，以俟飛仙之來。扁曰栖[棲]霞堂。崔清獻公登眺說之，於其前太霞洞右築庵遊息，今雖蕪沒，人猶指曰丞相庵云。正統末，妖僧德存言于中官阮能曰：「此景泰禪師卓錫泉也。」適景泰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偽立寺額，遇佛生日，作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氓扇亂，適能罷鎮守北還，德存就擒，禍變乃已。弘治初，大父雙槐府君上壽藏于泉之西南聚龍岡。而德存之徒，賽會喧囂猶故也。……嘉靖改元，臬副崑山魏公校以董學至，大毀寺觀，用復洪武彝憲，檄郡守簡侯沛率耆民躬往視之，顧泉上浮屠之宇蔽虧成蔀，當芳春伐木，斧斤錚相聞。僉謂：「經弗正，山弗寧。」於是言于部使

39 參見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 46-47；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十六世紀西樵山歷史變遷研究〉，頁 29-43。

40 湛若水，〈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 5，〈新創白雲書院記〉，頁 17-20，<http://hanji.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4 日。

41 宋至清羊城八景的演變歷史，可參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頁 430-446。

42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5，〈寺觀二〉，頁 143。

者暨藩臬，驅羣髡，剝厥居，使陟降，罔或不宜。……徵諸舊志，復名其山曰栖[棲]霞，水曰泰泉。已乃召承寺基，予以先塋伊邇，買於官，用直三十鎰，遂建泰泉書院，與子弟講學。……甲申孟冬載筆以紀勒于貞珉，詒後之人，俾毋忘其始。⁴³

黃佐強調，景泰寺是宋元時期「好事者」所結的庵堂。只是到了正統末因景帝繼位改元景泰，於是僧人德存與鎮守太監阮能宣稱這個地方是景泰禪師的卓錫泉之地，和景泰年號相符，所以「偽立寺額」。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魏校毀淫祠的布告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原無敕額」的寺觀。可是景泰寺的寺額應該是真的，據康熙《番禺縣志》載：

景泰寺在棲霞山泰霞洞。宋天禧間僧智嚴創，明正統十三年住持僧德存重建，遇景泰改元，以同號請易寺名。奉旨仍賜舊額，山半舊有僧歸亭。天順三年(1459)金城黃諫由內翰謫判廣州，易名廣趣，刻石記之，嘉靖中黃宮詹佐改為泰泉書院，移僧光孝寺。⁴⁴

景泰寺在景帝改元景泰時，以寺名與年號相同，請求更改寺名，於是景帝賜其舊額，天順三年廣州同知黃諫又更名為廣趣寺，成化《廣州志》還保存了黃諫的〈重修景泰寺記〉，黃諫稱之為景泰寺，可以為證。⁴⁵黃諫該記也完全看不出德存是妖僧的印象，而是一個得到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馬昂(1399-1476)、鎮守太監阮能等多位廣東主要官員禮遇的有德僧人。有這些官員的支持，德存要請到敕額也是合情理之事，不過黃佐強調這是偽額。於是在魏校大毀淫祠時，終於以「經弗正，

⁴³ 黃佐，《泰泉集》，卷 30，〈泰泉書院興作記〉，頁 1b-3a。科大衛也留意到這篇〈泰泉書院興作記〉，而轉引自後收於黃培芳(1778-1859)《黃氏家乘》之版本。見科大衛，〈明嘉靖初年廣東提學魏校毀「淫祠」之前因後果及其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頁 132-133。

⁴⁴ 孔興璉修，《(康熙)番禺縣志》，卷 4，〈建置〉，頁 395。

⁴⁵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5，〈寺觀二〉，頁 143。

山弗寧」的理由驅逐寺僧，召人承買寺基。黃佐以其父墳墓在側的理由用銀 30 鎰(計銀 600 兩)買下，在此處建泰泉書院。從黃佐的花費來看，他不僅是買下景泰寺的寺基，應該還包括景泰寺的田產，成化《廣州志》載景泰寺有田 21 頃 65 畝，⁴⁶這一數額非常巨大，由於不知黃佐所花費銀兩中，多少比例用於購買景泰寺的寺田(這些寺田應該以常住田為主，但由於洪武二十四年廣東歸併寺院時景泰寺也接收了一些其他寺院的田產，所以可能也帶有部分廢寺田)，也不知道寺田的賣價，所以無法進一步考察。

珠江三角洲的權勢之家奪取大量淫祠寺觀產業後，引發了廣東地方當局與民間相當大的爭議。因為這些田產被權勢之家奪取後，官府收不到賦稅，而寺院與勢家的新舊業主更替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租佃訴訟，也令廣東按察司應接不暇。嘉靖四年，兵部右侍郎姚鏌任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都御史。姚鏌上任後的首要大事，是對付廣西田州土官岑猛(1489-1526)，調兵籌餉乃最為重要之事。姚鏌在任上公開發佈的〈督撫事宜〉，有一條專門針對魏校毀淫祠後的田產問題：

一寺觀田地：訪得廣東先該提學副使魏校建議，拆毀淫祠及廢額寺觀。固亦懲創異端之盛舉也。但地土田塘等項，多被豪宗右族乘機強佔為業，或立作書院等項。不以業貧民而以資權貴，不以充國稅而以益私租。其名若美而實則非矣。以此人情大拂，士論不平。副使徐文溥(1480-1525)目擊奸弊，至謫奏牘，其概亦可知矣。及查本院節該案行二司官議處，久未見報。揆厥所由，蓋因各官畏避權勢，致有前卻。若不督行查理，終非國法。仰布按二司，即轉行各該守巡官，查照原行分投著實查理，務將各府州縣原設淫祠寺觀田塘地土頃畝號段，如系豪宗右族乘機強佔者，盡數清出還官議處，以充正稅，不必恤於怨詈。只在

46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5，〈寺觀二〉，頁 143。

奉公而行。仍限三個月以乘。各將清查過畝數備細造冊，星馳呈奪。毋得仍前延捱，取究不便。⁴⁷

姚鏌提到的核心問題，是這些原本要向官府納稅的田土被豪宗右族侵吞了之後，不能再「充國稅」，而收益都成為了豪宗右族的私租。姚鏌還提到，徐文溥擔任廣東按察司副使時，就因為看到這些權勢之家的奸弊而上奏。按徐文溥於嘉靖二年(1523)七月到四年一月擔任此職，在任上因為田土問題得罪地方權要，最後病故於任上。⁴⁸可見從魏校離任伊始，廣東當政的官員就開始想辦法重新分配這些寺觀淫祠的田土。姚鏌的清查命令發到布按二司之後，都因為官員「畏避權勢」而不敢認真執行。姚鏌的目標是要把被豪宗右族強佔的寺觀田土清理出來，由官府重新議處，「以充正稅」。姚鏌的政策觸動了當時在毀淫祠中獲益的方、霍為首的權勢之家的利益，所以《明史·姚鏌傳》稱：「初，廣東提學道魏校毀諸寺觀，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鏌至廣，追還之官。韜、獻夫恨甚，與張璁(1475-1539)、桂萼(?-1531)合排鏌。」⁴⁹姚鏌在嘉靖六年正月攻入田州，殺死岑猛而達到其任上威望的頂峰。可就在同年六月因田州與思恩府的土舍盧蘇、王受復叛而被迫致仕，由王守仁(1472-1529)接替其位。⁵⁰不過，姚鏌致仕之事，並

⁴⁷ 姚鏌，《東泉文集》，卷8，〈督撫事宜〉，頁748-749。

⁴⁸ 徐文溥的任命時間，見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29，嘉靖二年七月甲申條，頁787。病故時間，見方豪為其所撰〈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墓誌銘〉。方豪還說：「廣東沿海潮田最為民利，每苦勢家告許無休戚。公奏請比照江濱蘆州，稍稅之以資用而訟亦可息。厘革戎伍宿弊，奸胥墨吏靡不悚惕，又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慮貽太夫人憂，乃密招二弟托之，欲待命于南雄焉。」見方豪，《棠陵文集》，〈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墓誌銘〉，卷5，頁406-408。

⁴⁹ 張廷玉等修，《明史》，卷200，〈姚鏌〉，頁5278。

⁵⁰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77，嘉靖六年六月丙午，頁1709。

不只是方、霍等士大夫與姚鎮之間因為淫祠田產而引發的矛盾，以當時方獻夫、霍韜的地位可能尚未足以影響這一重大人事調整。實際上，這與當時朝廷中各派力量的競爭關係密切。鄧國亮的研究對此問題有專節討論，十分詳細地梳理了姚鎮與當時兩廣官員以及朝廷大臣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在姚鎮致仕一事上，方獻夫、霍韜或許因為寺觀田地問題對姚鎮不滿，但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二人有攻擊姚鎮的實際行動。對姚鎮最有力的攻擊來自當時的閣臣桂萼，桂萼是要透過打擊姚鎮，來打擊當時已經去位，但是與姚鎮關係非常密切的前首輔費宏(1468-1535)，以鞏固桂萼、張璁等議禮新貴的地位。⁵¹

姚鎮對寺觀田地的追還政策是怎麼操作的？〈督撫事宜〉只說「還官議處」，具體措施語焉不詳。姚鎮於嘉靖四年至六年提督兩廣期間，林富(1475-1540)於嘉靖二年至五年(1523-1526)擔任廣東右布政使。姚鎮實行追還政策時，林富是姚鎮政策的執行者。嘉靖五年，霍韜就追還寺產一事給林富之弟、當時謫任廣東雷州府徐聞縣丞、署順德知縣的林應驄(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長信，從中可以看到林富為代表的廣東地方官員與霍韜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士大夫之家在寺產問題上的激烈對立。井上徹也很重視這封信，但他認為這是嘉靖二年霍韜寫給廣東布政使林富的信。⁵²可仔細辨析，會發現井上徹弄錯了這封關鍵信函的時間和收信人，對理解這個問題產生很大偏差。根據林富、林應驄二人的任官履歷來看，霍韜這封信應該寫於嘉靖五年，而收信人是林應驄而非林富。⁵³考定明白這一事實才可進一步討

51 鄧國亮，〈明代中葉「藤峽三征」研究〉，頁91-105。

52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47。

53 林應驄、林富都是福建莆田人。林應驄字汝桓，林富字守仁，號省吾。霍韜文集目錄把這封信題為〈與林汝桓(名應驄)〉，可知林汝桓即林應驄。信中霍韜稱林汝桓為「執事」，稱林富為「令兄方伯先生」、「省吾先生」。

論。這封信的訊息含量非常大，茲就其內容作進一步分析。

在信的開頭，霍韜稱署順德知縣的林應驄秉承其兄右布政使林富的提議，要把魏校毀淫祠後沒入勢家的僧田用公帑贖回給僧人，霍韜把林富兄弟的政策提升到名教與異端、衣冠與禽獸的鬥爭層面，批評有司沒去管那些坐擁數十頃田業、「遊手坐食，削小民以自肥」的光孝、崇報等大寺院，反而和士夫之家「屑屑然較其錙銖之入」，責備林富兄弟對待士族的態度還不如異端。這是霍韜整篇書信的一個關鍵議題，與霍韜本人一貫的反佛教態度有關。第二個關鍵議題，則是分析僧田對士大夫之家的利弊。最重要的是僧田的負擔問題：

僧田糧差視民田倍重，非士夫之愚者，不取此為利，以自貽子孫無窮之憂也，不然則為家族之窮迫無聊者，出不得已之下計耳。當路君子曾不為之設身思？曰承僧田果利乎？害乎？與其取錙銖之利，孰與勿顧行檢，或郡或邑，漁獵數年，以自肥乎？士夫而利僧田可惡也，不有奸憐汙墨者乎，不尤可惡也乎？京

方伯即布政使的別稱，據萬曆《廣東通志》可知林富任廣東右布政使在嘉靖二年，其繼任為浙江上虞人葛浩，任職於嘉靖五年。見郭棐修，《（萬曆）廣東通志》，卷 10，〈秩官〉，頁 250。霍韜信中說：「第邸報不聞令兄敦擇何省，故書難致。」可見此時林富已經離任廣東右布政使，但還沒確定繼任省份。林應驄原任戶部主事，嘉靖三年二月因言事下獄，後謫為徐聞縣丞。見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36，嘉靖三年二月乙丑，頁 914。據萬曆《雷州府志》，林應驄於嘉靖四年謫任徐聞縣丞。其繼任為四川內江人蕭翰，十二年(1533)任。見歐陽保等修，《（萬曆）雷州府志》，卷 6，〈秩官志〉，頁 217。又信中說：「聞順德僧田則執事追贖唯恐不急。」按光緒《廣州府志》有「嘉靖五年，署（順德）知縣林應驄遷射圃於學門之東」的記載。見戴肇辰修，《（光緒）廣州府志》，卷 66，〈建置略三〉，頁 131。所以，霍韜該信應該是寫于林富剛剛卸任廣東右布政使、徐聞縣丞林應驄署理順德知縣的時候，時間是嘉靖五年。這個時間，霍韜正好在廣東家居。

官全免差役，十年而止。爾承僧田而脫十數年之差役，曾幾何時，或升外任、或休致、或物故，則亦平人之家耳，為利害曾幾何耶？⁵⁴

霍韜指出，僧田的糧差要比民田「倍重」，這一點非常關鍵。霍韜該信寫於嘉靖五年，這與《明宣宗實錄》宣德八年說廣東等地的寺田「止納秋糧，別無科差」的原則顯然有別。廣東的寺田什麼時候開始要應差，筆者尚未看到相關紀錄。據萬曆《漳州府志》記載，該地成化以後，凡寺田「一應徭差兵餉，與民田丁米通融編派」。⁵⁵廣東的寺田也許在某個時候也經歷了相同過程。可為什麼僧田糧差比民田重，霍韜這樣的士大夫仍然會承買？究其原因，其一是因為士大夫取得僧田的成本比較低，霍韜也承認寺田是「賤其直」來發賣的；二是在於士大夫的免役權。明代對士大夫之家的優免，雖然變化不一，但大致而言，里甲正役不免，雜泛徭役全免。如霍韜提到，像他這樣的京官，可以全免差役十年。其根據應是當時沿用弘治十七年(1504)制定的官員優免則例。⁵⁶即使糧差要比民田重，但由於京官家庭不需要承擔差役，只要交稅糧，就算僧田的稅則較民田稍高，也未到不可負擔的程度。所以起碼在這十年之中，經營僧田仍有利可圖。問題在士大夫死後，假如家族中不再有高級功名者，就要變成「平人之家」，不能再擁有優免權，所以霍韜說只有士大夫中的愚蠢者才會覺得這個是有利的，實際上是給子孫留下「無窮之憂」。⁵⁷

54 霍韜，《渭厓文集》，卷6，〈與林汝桓〉，頁145。

55 據林楓，〈福建寺田充餉淺析〉，頁48。

56 該則例規定京官「照舊例優免」，而地方官及舉人、生員等則按照其等級對人丁數字加以限制。見伍丹戈，〈明代徭役的優免〉，頁49-50。

57 張顯清指出，明朝的有些士大夫「在其為官戶時，不受里甲之擾，而在其成為官戶前、或由官戶敗落為民戶之後，則要承擔里役，以致家資傾蕩」。見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頁166。

霍韜認為，林富的出發點既然是「抑權要以扶公法」，那可以選擇的方法很多，但是霍韜絕對不能接受把寺田歸還給寺僧，他提議：

設曰惡其權要奪細民之利也，則嚴為禁曰：凡官戶勿承田，可也；舉而屬之軍餉，善為區畫以弭後弊，亦可也；或每都建一社倉，歲終出納，巡檢守之，縣官領之，亦可也。今既無善處之策，乃逼迫皇皇，奪既賣之田，出官銀贖回以資髡僧者，是此舉也，始則戾魏公所以斥僧道以扶名教之意，中則戾戶部所以議處軍餉之意，終則結果成就其抑奪士夫以取不畏強豪之譽而已。自是而異類益橫，凌辱士夫，誣奏風憲，皆不可禁矣。自是惟民田得舍與僧，僧田不可斷給民家矣。⁵⁸

霍韜為林富、林應聰設想了幾個處理方案，或者禁止官戶承田，或者把寺田「舉而屬之軍餉」，或者以寺田建社倉。霍韜提到林富的贖回政策細節，是「田自正管甲首以上，盡數給僧，惟畸零小戶，乃充軍餉」。霍韜說正管甲首以上的才是十數頃的大戶，而「淫祠」都是些數畝的小戶，所以林富的政策是「棄岱嶽而取塵埃」，對軍餉無甚裨益。⁵⁹從霍韜的立場來看，珠江三角洲的士紳之家同意對寺田問題進行重新處置，但用官銀贖回寺田給僧人則萬萬不可。

霍韜又說：

僧田發賣，雖曰賤其直適足以資權豪也，猶可取銀數千百兩為國家之利。今盡數給僧，則不惟軍餉無措，而銖兩之利亦歸之僧，官司無所賴矣，況復出官銀買田以給之耶？僧田為權要所利，猶吾人也，今給之僧，則舉而與禽獸矣。豈曰厚禽獸而薄吾人也？夫權要承田，固曰可惡，然人豈有十數百年不死者？苟

⁵⁸ 霍韜，《渭厓文集》，卷6，〈與林汝桓〉，頁145。

⁵⁹ 霍韜，《渭厓文集》，卷6，〈與林汝桓〉，頁145。

死矣，則子孫有求為平民不可得者矣，其為利為害可指日計也。⁶⁰霍韜承認「權豪」承田是用「賤直」取得的，這一行為「固曰可惡」，但他強調這些不過是「銖兩之利」，而且能讓官府收到「數千百兩」的田價。他重申，寺田如果交給僧人的話，軍餉無從籌措，而且連「銖兩之利」都收不上來了。而且把寺田交還給僧人的話，官府還要動用官銀向權豪購買寺田，這樣的話官府就「無所賴」了。所以，他表態支持將士大夫之家購買寺田的田價充作軍餉，來換取「權要」對寺田的保有權。霍韜迴避的是，寺田交還給僧人以後，還是要納糧應差，而霍韜這樣的官戶卻享有差役優免。

霍韜再說，等權要故去後，子孫都變會成平民，這些田的糧差也免不了。但這都是難於預測的身後之事，從現狀來看，權要們所佔據的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霍韜又繼續強調毀寺奪田與對抗「異端」的功勞，所以就算權勢之家因而獲利，也不應該「屑屑于計小利之錙銖」。霍韜告誡林應驄，說林富此舉是「憤激之過當」，而林應驄是「承行之過勇」。霍韜又對比南海與順德，說其家鄉所在的南海縣作為省城首縣，知縣還在「周悉思慮」，等待上司更好的善後之策；而在順德，林應驄則「追贖唯恐不急，給髮唯恐不早」。霍韜告誡林應驄，同時也要林應驄轉告林富要「翻然改悔」。最後，霍韜說自己受林富的照顧很多，自己家族的祠堂、社學、書院、學田、祠田都有林富幫忙的功勞。⁶¹霍韜這番話，把本家族財產的積累與林富關聯起來，若林富再對霍韜所承買的寺產重新處置，也有違林富照顧霍韜家族的初意。

霍韜的結尾耐人尋味：

⁶⁰ 霍韜，《渭厓文集》，卷6，〈與林汝桓〉，頁145。

⁶¹ 霍韜，《渭厓文集》，卷6，〈與林汝桓〉，頁145。

幾欲致書講此事，第邸報不聞令兄敷擇何省，故書難致。執事幸詳思此事，力可改，尚可語當路君子，共改圖焉，切勿重於改悔，多為異說，以自文為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解說之累也。仍便付此草于省吾先生共細思其詳悉，毋曰初議，卓有定論，而重於改過，為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揅之累也。⁶²

這段話可知，由於林富要從廣東調職了，但是邸報沒有說明所調何處，所以沒辦法直接寫信給林富，請林應聰轉達，並和「當路君子」說明此事，一起改正，不然就會留下不可挽回的後果。此處當路君子也許就是不便明言的，當時主政兩廣的姚鏌。

總而言之，霍韜這封信其實是對林應聰及其背後的林富、姚鏌的一封信辭激烈的交涉書。井上徹認為，「霍韜氣憤這種對『異端禽獸』優厚的作法」。⁶³但這只是霍韜書信上所強調的道德理由。在經濟層面來看，霍韜也自知勢家奪取寺產這一行為不甚光彩，所以其信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士紳之家也會變成平民，到時候寺田就會成為負擔。

霍韜在給林應聰的書信中提到林富當時已經調離廣東，但霍韜表示不知道林富「敷擇何省」。林富同鄉柯維騏(1497-1574)所作〈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則把林富被調任的原因與「為忌者所中」聯繫起來：

[林富]連升廣東右布政。先是魏督學毀寺，籍其田。巨室爭利之。富定議以田充軍餉、給學膳，以地為書院、社學、醫學有差。闖掠崇報寺腴田五千畝，稱寺故市舶所建，聞富欲毀，乃撤佛像祀先聖。富謂於制匪宜，闖又移文御史，改祀崔清獻。富謂闖圖土田，以聖賢藉口，卒毀之。……丙戌入覲為忌者所中，調廣西。⁶⁴

⁶² 霍韜，《渭厓文集》，卷6，〈與林汝桓〉，頁145。

⁶³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47。

⁶⁴ 柯維騏，〈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58，〈都察院五〉，頁171。

林富在傳記中被塑造為毀淫祠政策的堅定執行者。這一點與霍韜書信中維護僧人利益的形象大相徑庭。這一對比，不知是否為了回應霍韜那封言辭激烈的書信中對林富形象的詆毀。有意思的是，崇報寺正是霍韜在書信中指責林富不去處理的坐擁數十頃田土的大寺院。林富毀崇報寺的記載，未見於其他同時代的文獻，但值得注意的是，崇報寺確實是由前代市舶司所建，而且是有敕額的佛寺。在成化《廣州志》中，明確記載該寺由「市舶司始創啓之，以為番舶祈福之所，唐大觀中賈胡捨財重修，市舶司請於朝，賜今額」。該寺在洪武二年(1369)被毀，其址作為南海縣縣衙，佛像、僧田地塘併入西禪寺，原有南海、番禺、高要等處田地共有 4,902 畝。⁶⁵成化《廣州志》記載的崇報寺田土數字與〈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提到的腴田 5,000 畝的數字非常接近。按林富的傳記，似乎是市舶司的宦官重新恢復了崇報寺的名號，接管了崇報寺原有田產。林富對此並不賣帳，認為宦官以奉祀聖賢為藉口，圖謀田土，最終林富仍然毀寺，其舉是否受了霍韜信的影響不得而知。傳記所指丙戌即嘉靖五年，正是霍韜給林應驄寫信之年，柯維騏說林富是被「忌者所中」，所以調任廣西。未指出「忌者」是什麼人，但從行文來看，也許指從魏校毀淫祠中獲利的「巨室」或宣稱擁有崇報寺的市舶司太監。按嘉靖二年，霍韜再疏乞歸，方獻夫亦在嘉靖四年四月以妻子病故為由還鄉，直到嘉靖六年五月二人才在嘉靖皇帝一再催促下重新北上。⁶⁶所以嘉靖五年林富調職時，二人都不在朝任職，應該沒有能力決定林富的去留，這大概也是為何霍韜只能給林應驄寫信的原因之一。

⁶⁵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卷 24，〈寺觀一〉，頁 127。按唐代無大觀年號，疑為宋之誤。

⁶⁶ 霍韜，《石頭錄》，卷 2，頁 217-218；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50，嘉靖四年四月庚戌，頁 1261；卷 76，嘉靖六年五月丙申，頁 1702。

林富調任廣西右布政使之後，協助王守仁撫平田州的復叛。而方獻夫則主動上奏推薦林富為都御史駐紮田州，可見此時方獻夫對林富頗為友善。⁶⁷王守仁也於嘉靖七年(1528)二月十三日、四月六日兩次上疏請求皇帝「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不過朝廷最終沒有採納方獻夫與王守仁的意見，而是在同年五月二十二日陞林富為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⁶⁸雖然林富沒有按方、王等人的意願繼續駐守田州，但其官職卻獲提拔。由此看來，在嘉靖六、七年間，林富與方獻夫、霍韜等廣東士大夫的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在寺田問題上，方、霍等廣東士大夫與林富大概也達成共識，正如柯維騏所言，林富最終「定議以田充軍餉、給學膳」，如果是指以寺田田價充作軍餉的話，就與霍韜書信裡面的「舉而屬之軍餉」等建議一致。⁶⁹不久王守仁病重，於嘉靖七年十月舉林富自代後不候命即歸，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於贛州南安。⁷⁰嘉靖八年正月，剛剛升任鄖陽巡撫不久的林富，隨即晉升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提督軍務，成為兩廣地區最高軍政長官。⁷¹

⁶⁷ 方獻夫上疏稱：「田州乃邊境要地，又去軍門遠涉……臣願陛下暫置都御史一員，同廣西副總兵專在田州駐紮，一聽守仁節制。……臣見見任廣西右布政使林富識見優長……臣願陛下即用其人，則必能悉心協力贊輔守仁，以收全功矣。待事寧之日，別議取回，或即與巡撫可也。」見黃佐修，《(嘉靖)廣東通志》，卷 62，〈方獻夫〉，頁 1603。

⁶⁸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14，〈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頁 477；〈舉能撫治疏〉，頁 494-496。

⁶⁹ 井上徹也認為林富採取了霍韜的提案。不過井上徹根據信中霍韜指責光孝寺、崇報寺有數十頃田就認為「林富不是將判定為淫祠寺院的僧田反還給原來的寺院，而是採取了將其歸屬給了作為正祠的寺院」這一說法，證據不充分。見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 47。

⁷⁰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5，〈年譜三〉，頁 1323-1324。

⁷¹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15，〈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頁 522-

四、嘉靖十一年龔大綏彈劾方獻夫、霍韜之案

林富在兩廣的任上似乎並不順遂，由於「山賊海寇」問題處置不力，就任不久即屢屢向嘉靖皇帝上疏乞歸。⁷²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朝廷終於以陶諧(1474-1546)代總督兩廣。《明世宗實錄》稱原因是當時「廣寇未靖」，嘉靖皇帝疑心林富「有所規避，下巡按御史核狀以聞」。吏部以不能耽誤機宜為由，預先派遣官員接替林富的職位。⁷³到了六月，由於廣東海賊許折桂的問題，林富等一大批官員受到牽連：

先是，廣東海賊許折桂等聚眾流劫。有旨責令地方官戴罪剿賊。已，賊勢益熾，佯求撫以緩我師，大肆鹵掠。指揮劉瀚督戴罪指揮焦鈺、柯榮入海撫諭，賊執鈺、榮以襲虎頭門，遂薄省城，所殘傷不可勝數。巡按御史吳麟(1485-1553)以聞。上以鎮巡等官玩寇，令兵部覆狀奏，乃罷巡撫林富與原任分守參議王洙俱為民，海道副使江良材(正德九年進士)、分巡僉事龔大綏(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都指揮歐儒、王蘭俱褫職閑住。總兵官仇鸞(?-1552)及兩廣巡撫陶諧俱戴罪，刻期殺賊自效。其餘文武官有地方責者皆停俸，以吳麟不從實參奏，令自陳狀。麟上疏引罪，命奪俸半年。⁷⁴

從《實錄》來看，林富等大批官員落職是由於海賊許折桂進犯省城所致，此事引發兩廣官場震盪，上至巡撫、巡按，下至守土文武官

524；卷 35，〈年譜三〉，頁 1324；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97，嘉靖八年正月乙巳，頁 2261-2262。

⁷²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00，嘉靖八年四月辛卯，頁 2382；卷 109，嘉靖九年正月甲寅，頁 2573；卷 134，嘉靖十一年正月戊辰，頁 3173。

⁷³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36，嘉靖十一年三月己未，頁 3207。

⁷⁴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39，嘉靖十一年六月癸卯，頁 3261-3262。

員都被追究責任。柯維騏所撰林富傳記這樣解釋其落職的原因：

[林富]累疏乞休。時方獻夫家眾怙勢奪民產。富付僉事龔大稔裁以法。乞休疏至，獻夫取旨，回籍聽勘。富將歸，海寇許折桂為梗。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檄巡海副使某出兵，及兵敗將沒，則反以失事為富罪。獻夫從中應之，遂落職。大稔隨被逮以死。⁷⁵

柯維騏把掀起一番大風波的龔大稔彈劾方獻夫、霍韜一案，與林富的落職聯繫起來了。柯維騏說兵敗的責任在「御史」，無疑是指巡按御史吳麟。由於材料所限，兵敗到底是林富還是吳麟的責任已經難以分辨。但此說有一個疑點，三月林富乞休疏到朝廷的時候，方獻夫還在從廣東到北京的路上，當時主持吏部的還是尚書王瓊(1459-1532)。⁷⁶所以方獻夫「取旨」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方獻夫當時肯定還不能直接影響皇帝與吏部的決定。五月方獻夫抵達北京後，以武英殿學士兼吏部尚書的身份入閣。⁷⁷方獻夫以廣東南海出身的閣臣之尊，對廣東海賊失事處置的影響力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就算三月林富「回籍聽勘」不是方獻夫所為，但六月林富等一大批官員的落職肯定要得到方獻夫支持才能通過。如與方獻夫及霍韜關係不好的分守參議王洙、分巡僉事龔大稔等，都收到褫職為民或閒住等嚴厲處罰。⁷⁸

受到牽連的龔大稔於七月上疏，彈劾方獻夫及霍韜居鄉不法事。這當然不只是龔大稔與方、霍二人的個人恩怨，正如霍韜在為自己辯

⁷⁵ 柯維騏，〈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58，〈都察院五〉，頁 172。

⁷⁶ 據《實錄》，嘉靖十一年四月的時候，方獻夫還在江西，聽說皇帝有微恙，上疏問安，皇帝「嘉其忠愛，促令速赴供職」。見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37，嘉靖十一年四月己亥，頁 3230。

⁷⁷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38，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頁 3250。

⁷⁸ 王洙、龔大稔與方獻夫、霍韜之間的矛盾，可參見霍韜，《渭厓文集》，卷 3，〈辯明讎誣疏〉，頁 570-571。

解的奏疏中提到，當時議禮諸臣，張璁已致仕、桂萼病故、方獻夫則在回北京的路上稱病，所以霍韜稱那些因為議大禮而得罪閒住、謫戍的官員認為這是一個「掃滅」議禮諸臣的機會。霍韜把龔大綏彈劾自己和方獻夫，歸因於方、霍等議禮諸臣的政敵的謀劃，說：「今日之誣雖出龔大綏之口，然內外構議，遠近合謀，機械翕張，非一人之力，非一日之故矣。」⁷⁹

當時因議大禮而引發的政治鬥爭，在這裡不多作展開，只就指控事實作進一步討論。《明世宗實錄》節錄了龔大綏奏疏的部分內容，在針對方獻夫的指控上，龔大綏稱：

獻夫以陰鷙之資，縱溪壑之欲，而韜又以剛狠翼之。各任親族、盤結黨與、侵奪鹽利、籠絡貨權、分據要津、並為龔斷。毀官署、移巡司以便其私，奪禪林、攘寺產而擅其利，在二臣猶為細事。甚者若仁王寺基，已改先儒朱熹書院，而獻夫奪之以廣其居，又受奸僧梁鼇投獻田土，奴畜之。鼇有罪當逮，匿護不以就鞠。⁸⁰

黃佐所編修的嘉靖《廣東通志·霍韜》中，還記錄了一段嘉靖十一年廣東按察僉事龔大綏彈劾方獻夫和霍韜的文字，可作補充：「初，大綏與方獻夫有隙，訟方氏者皆為准理，因廖鵬雲等犯罪，懲治方氏家人，韜憤為之作俗毒牘解，又因治仁王寺朱琳獄，韜益不平，復作續俗毒牘解。」⁸¹這裡提到兩宗案件的關鍵人，在現有文獻都未見記載。龔大綏彈劾的焦點集中在方、霍二人「各任親族、盤結黨與、侵奪鹽利、籠絡貨權」、毀官署、奪寺產、「保養奸回，沮撓法守」等事。其中龔大綏最強調的就是方獻夫奪取仁王寺的問題。此疏上奏之

79 霍韜，《渭厓文集》，卷3，〈辯明讎誣疏〉，頁571-572。

80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140，嘉靖十一年七月辛酉，頁3272。

81 黃佐修，《（嘉靖）廣東通志》，卷62，〈霍韜〉，頁1609。

後，方獻夫隨即上章自辯：

惟正德九年(1514)，有詔毀鬻淫祠，臣時為郎家居，而仁王寺寔近臣宅。臣因輸直，告請為業，並買寺田若干。近耕者以爭佃訟，大稔深劾之，構成重獄，陰欲蔑臣，臣面以理折之，業已屈服矣。頃因臣被召，自生疑忌，又欲承望風旨，奏劾霍韜，恐臣為韜地，遂並詆臣。且大稔以海洋失事，被論褫職，乃欲藉此立名，以為後階，其奸譎可見。⁸²

據《明實錄》記載，方獻夫稱龔大稔彈劾是因為自己「嘗諷其行事乖方，用刑酷暴，遂益恨臣，陰求所以中臣」，以此表明龔大稔所劾出於一己之私。又自辯龔大稔所訐之罪名，主要就仁王寺及「保養奸回」二事辯駁，方獻夫說仁王寺是在正德九年為郎家居時所買，回避了「寺基已改先儒朱熹書院」的攻擊。至於奴畜奸回之事，方獻夫亦只稱龔大稔「陰欲蔑臣」，又回避了畜奴的問題。井上徹認為，龔大稔的上奏反映了當時勢家強佔寺產的情況，但認為無法確定龔大稔的告發及方獻夫和霍韜的辯解到底哪一方的陳述是事實。⁸³從龔大稔及方獻夫二疏來看，龔大稔的攻訐雖然有挾私之嫌，但方獻夫對其攻擊事實則無法正面反駁。此處提到的仁王寺，在成化《廣州志》中被稱為護國仁王禪寺，據說晉太康二年(281)由西竺佛教徒迦摩羅所建，有田 25 頃。⁸⁴亦即魏校公移中的粵秀山附近的「仁皇廢寺」。⁸⁵仁王寺在魏校任提學時已經是「廢寺」，據方獻夫所言是正德九年「有詔毀鬻淫祠」的結果。方獻夫提到的這一詔令在現有文獻中都沒有發現。

⁸²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40，嘉靖十一年七月辛酉，頁 3273-3274。

⁸³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頁 46。

⁸⁴ 吳中、高澄修，〈(成化)廣州志〉，卷 24，〈寺觀一〉，頁 128。

⁸⁵ 魏校，〈莊渠遺書〉，卷 9，〈為崇正學以辟異端事〉，頁 870。

按方獻夫在正德七年(1512)至嘉靖二年初都在廣東家居。⁸⁶因此魏校毀淫祠時，如果方獻夫此時已經承買了仁王寺基，魏校若無視方獻夫先前的購買權，又將其奪過來改為奉祀朱熹的晦翁書院，似乎不合情理。方獻夫上疏辯護時，強調自己於正德九年時買入的所有權，卻隻字不涉已改書院之事。而魏校將其改為晦翁書院時，又未見提及方獻夫對仁王寺基的佔有權。霍韜在其申辯中也提到仁王寺的問題，稱「此地皆撫按明文召人承買，地止十畝七分，彼則誣曰五十畝」，⁸⁷強調的也只是寺基的面積大小有誤，同樣迴避了改建書院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黃佐在嘉靖六年編成的《廣州志》中記錄了晦翁書院，但在其主纂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廣東通志》中所羅列的廣州府眾多書院中，卻沒有晦翁書院了。⁸⁸成書於嘉靖十四年，由戴璟(嘉靖五年進士)主修的嘉靖《廣東通志初藁》中亦記有晦翁書院，但只說該書院原為仁王寺故址，嘉靖二年由魏校改建，並未說明此後的變化。⁸⁹而從方獻夫的回奏可知，最晚在嘉靖十一年，該寺就已經是方獻夫的產業了。《廣東通志初藁》中有一篇方獻夫所作序文，可見戴璟與方獻夫關係良好，戴璟可能是刻意迴避了方獻夫奪取仁王寺的問題。崇禎《南海縣志》中，則稱晦翁書院「久廢」。⁹⁰將嘉靖六年到嘉靖三十六年之間晦翁書院的消失，與嘉靖十一年龔大綏的彈劾對照，方獻夫攘奪已改為晦翁書院的仁王寺基之嫌疑非常大，正德九年就已承買仁王寺基的辯護並沒有堅實的證據。

86 李本，〈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方公神道碑銘〉，收入《南海丹桂方譜》，〈方譜祠墓·神道碑〉。

87 霍韜，《渭厓文集》，卷3，〈辯明讎誣疏〉，頁572。

88 黃佐修，《(嘉靖)廣州志》，卷28，〈學校下〉，頁399；黃佐修，《(嘉靖)廣東通志》，卷38，〈禮樂志三〉，頁925-929。

89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藁》，卷16，〈學校〉，頁313。

90 朱學熙修，崇禎《南海縣志》，卷7，〈禮樂志〉，頁296。

關於龔大稔對霍韜的彈劾，在《明世宗實錄》所節錄的疏文稱：
 韜居南海，乃受高要縣民投獻，而爭過沙塘，致傷人命。臣理
 官也，據法以塘歸主，以殺人者抵罪。韜乃取獄詞，標榜名曰
 《俗毒牘解》送臣，脅使翻案。⁹¹

這一疏文節錄得太簡略，不過霍韜回應龔大稔彈劾的〈辯明讎誣疏〉還收錄在其文集中，可資對照。從霍韜該疏來看，霍韜強調的有三點。其一是議大禮中失勢官員對「議禮諸臣」的攻擊。其二是指責龔大稔的彈劾是「添捏塘稅」。霍韜辯稱自己家族所購田土不過稅 30 畝，而龔大稔則添塘稅 19 頃，這個數字是霍韜所報 60 倍，兩者之間差距相當大，一方面也許是龔大稔誇大其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真實田塘面積與稅收面積之間的反差，因為霍韜反駁的只是稅畝的數字，而沒說明真實田土的面積數字。其三則是為自己守制期間註供詞解釋，稱是為了辯解龔大稔在爭沙塘一案中對自己的誣蔑。⁹²以上三點除了第二條外，大多沒有涉及事實層面的問題。

黃佐《廣東通志》霍韜傳還提到龔大稔指控霍韜「既取寶峰寺改建書院，並攘化成、千秋、寶鎮、崇聖等寺田土」。⁹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指控在霍韜的〈辯明讎誣疏〉中都沒有回應。霍韜將西樵山寶峰寺改建書院的詳細過程，可參見已有研究。⁹⁴至於其他各寺田土，在成化《廣州志》中都有記錄，化成寺位於南海鼎安都大同堡，宋紹興十年(1140)創，有田 5.79 頃；寶鎮寺，成化《廣州志》作寶真寺，在南海黃鼎都張槎堡，宋嘉定十一年(1218)創，元至治二年(1322)何氏嫗捨田

91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40，嘉靖十一年七月辛酉，頁 3273-3274。

92 霍韜，《渭厓文集》，卷 3，〈辯明讎誣疏〉，頁 571-572。

93 黃佐修，《(嘉靖)廣東通志》，卷 62，〈霍韜〉，頁 1609。

94 任建敏對從寶峰寺到四峰書院的變化及霍韜強占寶峰寺故事演變的考察。見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頁 104-123。

地塘 4.38 頃；崇聖寺，在南海鼎安都沙頭堡，宋乾道間創，有田 95 畝；⁹⁵千秋寺，在廣州城西南仙湖街，五代南漢時創，元末毀，洪武三年(1370)以其地為按察司，有田 13 頃，其精巧佛像都移入了光孝寺。由於千秋寺在元末即被毀，成化《廣州志》所記錄的千秋寺田土，也許是屬於廢寺田的性質。⁹⁶

龔大綏對霍韜這些指控是否站得住腳，還要從霍韜當時所處環境來考察。根據《石頭錄》的記載，霍韜在正德十六年(1521)初已經北上謁選，一直到嘉靖二年五月底才返抵廣東。⁹⁷而魏校在正德十六年八月才就任廣東提學副使，在嘉靖二年七月以後離開廣東，所以兩人在廣東的時間交集大概是在嘉靖二年五、六月之間，這時已是毀淫祠行動的尾聲，就算霍韜要奪取大量的寺田，他親自參與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霍韜不在廣東期間，其家族成員，尤其是四弟霍任(字尹先)，加意經營其家族的產業。霍韜在家書中就提到：「化成寺地基及前田塘，先聞尹先承了，可與執事收管，以助為善。」可見他知道化城寺及其田產由霍任承買，而且沒有表示反對，只說要拿來「為善」。不過他又囑咐道：「仍說尹先，諭家中兄弟，再或增分厘產業，積子孫罪過，只守得舊足矣。有餘推之親友，無益事勿幹。」⁹⁸即使霍韜本意沒有打算購入這些寺田，但是家族成員仍然仗其之名涉足各種生意，如採石、開礦、賣鹽、做沙等。⁹⁹為此，他屢屢在家書中告誡家人，例如他給好友郭肇乾的書信中提到：

⁹⁵ 吳中、高澄修，《(成化)廣州志》，卷 25，〈寺觀二〉，頁 133。

⁹⁶ 吳中、高澄修，《(成化)廣州志》，卷 25，〈寺觀二〉，頁 145。

⁹⁷ 霍韜，《石頭錄》，卷 2，頁 223。

⁹⁸ 霍韜，《渭厓文集》，卷 7，〈與冢山書十〉，頁 167。

⁹⁹ 霍韜家族在嘉靖年間的產業經營情況，可參見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頁 145-156。

予每戒家人，勿生事，勿求官司，勿得罪鄉里，過人口舌。何為又去賣鹽，又開銀礦，又去做沙，皆不知足也。賣鹽做礦，必置之法，不許解救，愈解此處，行之愈急，是速致死也。我今為天下任怨，只求致太平，不負古聖賢行道濟時之志。如家人生事累我，則道不行於家矣，又何望行于國天下？¹⁰⁰

霍韜家族在霍韜為官以前的經濟環境可能不佳。《石頭錄》正德十年(1515)條，霍韜從孫霍尚守註釋稱：「公素貧，兄弟五人，田不滿四十畝。」¹⁰¹而在霍韜之父霍華(?-1517)卒於正德十二年之時，霍韜自己也宣稱「貧不克葬」，還特別提及了廣州知府魏廷楫(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的幫助。¹⁰²而到了嘉靖年間，霍韜家族已經廣泛涉足珠江三角洲的多處產業，由此可見其家族財富增長之迅速。在這種情況下，霍韜大概也很矛盾，自己如今「為天下任怨」，而家人卻「生事累我」，顯然他很難限制家人的行為，不然他也不必在家書中屢屢告誡。因此，龔大綏的說法應該是有一定根據，雖然承買寺田的經手人不是霍韜，但還是霍韜家族打著他的名號操作的。

總而言之，龔大綏彈劾有關方、霍二家的指控，或多或少是方獻夫、霍韜所不能完全辯駁的。但嘉靖皇帝並沒有進一步追查的打算，他對龔大綏彈劾一事的回應是：「龔大綏系地方失事官員，該巡撫官奏，已有旨拿問了。著巡按御史提解來京問理。都察院知道。」¹⁰³《實錄》記載龔大綏在此事中法司給出的處置是「輸贖回籍閑住」，而嘉靖皇帝的批示則是「特黜為民」。¹⁰⁴嘉靖《廣東通志》則稱「大綏逮

¹⁰⁰ 霍韜，《渭厓文集》，卷7，〈與冢山書十一〉，頁168。

¹⁰¹ 霍韜，《石頭錄》，卷1，頁198。

¹⁰² 霍韜，《渭厓文集》，卷5，〈樵儲錄序〉，頁78。

¹⁰³ 霍韜，《渭厓文集》，卷3，〈辯明讎誣疏〉，頁572。

¹⁰⁴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140，嘉靖十一年七月辛酉，頁3273。

去，坐罪罷歸」。¹⁰⁵不過，柯維騏卻在林富傳記中稱龔大稔是因為管束方獻夫家族的惡行而被逮至死，沒有提及龔大稔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他在削職以後上疏彈劾方獻夫及霍韜。由此看來，柯維騏所作傳記，頗有加工改造之處。嘉靖十一年十月巡按直隸御史馮恩(嘉靖五年[1526]進士)彈劾方獻夫，重提龔大稔彈劾之事，說方獻夫沒有引咎請罪，反而肆意「佞辯」。嘉靖皇帝看了很不高興，說馮恩是「假以星變，妄騁浮詞，論列大臣，中藏恩怨，巧事譏評，大肆非毀，必有主使傳寄之人，命錦衣衛官校扭械來京問」。¹⁰⁶由於嘉靖皇帝的明確態度，方、霍等權勢之家在地方是否有侵佔田地的行為，並未得到追究。

從嘉靖二年魏校去任伊始，一直到嘉靖十一年林富的落職，圍繞珠江三角洲地區大量寺產的處置問題，地方權勢之家與廣東有關主政官員的較量一直持續進行。由於這些權要與嘉靖皇帝的密切關係，所以在這一問題上屢占上風。隨著林富、龔大稔的去職，未再掀起大波瀾。

五、嘉靖中期的寺田變賣及其賦役政策

經過嘉靖初年的爭議，權勢之家佔有的田產得到廣東當局的承認，而地方官府為了保證能夠收得其賦稅，則在嘉靖五年經林富定議，將田價充作軍餉等用途。這一點十分關鍵，意味著官府仍有再處置這些寺田的權力。此後，對待毀淫祠寺觀留下來的田產，都以繳納軍餉的原則來承業。代表廣東有司一方的林富雖然在與方獻夫、霍韜等廣東士大夫的鬥爭中落敗，但他的政策卻得到延續，確保寺田買賣的收入充作軍餉。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湛若水透過黃佐的轉介，購買白雲寺基址創立白雲書院時，其程序就是官府「召賣者，准湛瑤納軍餉，

¹⁰⁵ 黃佐修，《(嘉靖)廣東通志》，卷 62，〈霍韜〉，頁 1609。

¹⁰⁶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 143，嘉靖十一年十月丙申，頁 3343。

出帖稅付管」。¹⁰⁷湛若水提到，白雲寺在毀寺之初，其寺田已「盡充于鄧氏」，「獨留勝基以待甘泉子之來」。¹⁰⁸所以他讓「家人出軍餉之金以兌於官，收十畝之稅以供於公」。¹⁰⁹可見購買寺基及所附 10 畝田土都需要繳納軍餉，湛若水以家人湛瑤的名義向官府交納軍餉，取得帖稅管業。「供於公」，也許是湛若水強調他會如數交納公家的糧差。他之所以願意這麼做，證明當時寺基的實際價值仍然比需要繳納的軍餉數字要高。

不過，軍餉這個名目是一個無底洞，嘉靖年間開支浩繁的財政，使廣東主政官員想辦法開源。民田的牽涉面太大，不能輕易加徵，但被指定作為軍餉用途的寺田仍然可以作進一步的處置。隨著嘉靖十三年(1534)方獻夫致仕、十九年(1540)湛若水致仕、霍韜在禮部尚書任內病逝，嘉靖初年顯赫一時的嶺南仕宦大為衰落。¹¹⁰霍韜在嘉靖五年寫給林應驄書信所說「(權要)苟死矣，則子孫有求為平民不可得者」，變成現實問題。霍韜家族族譜記載的寶峰寺寺田，可以看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後寺產的糧差負擔逐漸加重：

¹⁰⁷ 湛若水，《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 5，〈新創白雲書院記〉，頁 17，<http://hanji.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4 日。科大衛據屈大均《廣東新語·白雲書院》條：「泰泉黃公以景泰為泰泉書院，鐵橋黃公以月溪為鐵橋精舍，甘泉湛公以白雲為甘泉書院。」認為湛若水在此處所創建者為甘泉書院。見科大衛，《皇帝和祖宗》，頁 122。但據湛若水文集及羅洪先所作湛若水墓表可知，以甘泉為名者在湛若水家鄉、溧陽，而在白雲山者實則白雲書院。

¹⁰⁸ 湛若水，《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 5，〈白雲開山仙祖祝聖壇記〉，頁 29，<http://hanji.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4 日。據湛若水記，此處白雲開山仙祖指安期生。

¹⁰⁹ 湛若水，《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 5，〈歐陽公修白雲精舍記〉，頁 23，<http://hanji.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4 日。

¹¹⁰ 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頁 283。

簡村堡排年呈首西樵寶峰寺僧姦淫不法事，准析寺賣田。時文敏公家居，承買寺田三百畝，作大宗蒸嘗。嘉靖十九年文敏公薨。二十一年，寺田復奉勘合，發賣增價。僉事與瑕(1522-?)、分宜與瑞增價買回。內將二頃入祠堂，將五十畝入社學，五十畝贍族。嘉靖三十九年(1560)復奉勘合增價。瑕、瑞兄弟哀訴于兩廣鄭軍門，行府縣議減納餉，乃得為祭祀，計田二頃，僧米十石七斗，又加虛稅糧二石七斗，所入甚薄，而糧差甚重。每歲春秋祭祀外，存積不多。與瑕慮寺田終有更變，乃樽縮前租，買到簡村堡田數十畝，永作大宗蒸嘗。¹¹¹

這一段記載蘊含的訊息十分豐富，由此可見霍氏承買寺田後的問題。其一是寺田的所有權並不是完全過渡到霍氏家族，官府仍然可以在日後多次增價發賣。其二是寺田的糧差較重，收益不多。

關於寺田增價問題。霍韜所承買的寶峰寺及其寺產，在嘉靖二十一年、三十九年兩次奉勘合，發賣增價，後皆為霍韜之子霍與瑕(1522-1598)、霍與瑞(1539-?)等人增價買回。嘉靖年間多次變賣廢寺田，與當時軍費以及土木開支浩大有關。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二十一年三月，戶科都給事中郭鋈(嘉靖十一年進士)等條陳六事中就提到福建「變賣廢寺田價租銀亦不下數萬，宜查催解用，他省仿此」。¹¹²由此可見，是年變賣寺田並不是福建一省的行動，而是多省展開。廣東的特殊性在於，嘉靖二十一年朝廷下詔變賣廢寺田以前，很多寺院的田產早已在魏校任提學時賣出了。

嘉靖二十一年奉詔發賣寺田充餉，在廣東的地方志中留下了零星紀錄。據萬曆《新會縣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詔賣各寺觀田

¹¹¹ 《石頭霍氏族譜》，卷1，〈祠記〉，無頁碼。

¹¹²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259，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壬午，頁5179-5180。

地。邑僧田，民已先自出錢兌買，畝上銀四兩，中三兩，下二兩。原有僧者，僧收其稅，寺廢僧亡者，里豪爭收其稅。至是議賣，知縣何廷仁定價太重，民破產鬻子不能償。」¹¹³發賣寺田是在嘉靖二十二年，而非二十一年，也許是因為這一措施在廣東各縣推行時有先後。該條意思比較模糊，看上去似乎是在二十二年以前，新會的寺田就已經大部分被變賣了，該志用僧田而不用廢寺田來描述這些田產，因此更可能是指常住田，但也不排除包含廢寺田。當時是以每畝 2 至 4 兩的田價賣給新會的「民」。這些寺田的「稅」，似乎應該解釋為「稅業」，「里豪」爭的是寺田的土地納稅權，亦即所有權。寺田被變賣，也許就是在魏校任上發生的。到了二十二年，由於皇帝下詔出賣寺觀田地，這些已經被變賣的寺田重新「議賣」，方志稱當時的知縣何廷仁(1483-1551)把寺田價格定得太高，已經承買寺田的民要再繳納一筆高昂的田價，導致破產、鬻子都不能償還的情況。

除了新會縣，廣東其他各縣也有對這次奉詔賣寺田定價過高的說法。如嘉靖十七年起擔任潮州府大埔知縣的李桂，在其任內，因為「本縣多僧田，近例重徵軍餉，桂因民訴，輒為申省之」。¹¹⁴又如二十年擔任南雄知府的胡永成，在其任內「奉詔賣僧田，督催峻迫，毅然拒之」，其理由是南雄民「貧樸，若責其賣祖田而買僧田，非民牧也」。¹¹⁵可見，二十一年發出賣寺田充軍餉的詔令時，由於先前魏校毀淫祠寺觀時大量寺田已經賣掉了，所以廣東地方政府在執行這一詔令的過程中，是將那些已經賣出去的寺田「發賣增價」，再要求已經買了寺田的買主再交一筆田價。各縣的寺田價格似乎是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所以新會縣因定價太高導致怨聲載道，而南雄府、大埔縣等地則在「督催峻迫」之下，設法減輕籌餉的壓力。

¹¹³ 王命璿修，《(萬曆)新會縣志》，卷 1，〈縣紀〉，頁 24。

¹¹⁴ 郭棐，《粵大記》，卷 12，〈宦跡類〉，頁 227。

¹¹⁵ 余保純，《(道光)直隸南雄州志》，卷 3，〈胡永成〉，頁 56。

《石頭霍氏族譜》對於嘉靖三十九年的寺田再次增價，沒有更多的說明。對照崇禎《博羅縣志》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工興，鬻廢寺田」的記載，¹¹⁶此處大工，指的是該年四月由於雷雨導致紫禁城三大殿等處被焚毀後耗資巨大的重建工程，直到四十一年(1562)九月方告完工。¹¹⁷《石頭霍氏族譜》提到三十九年增價之事，大概也與三大殿重修經費有關。

廣東地方官府不僅可一再對寺田增價發賣，而且在認為有需要的時候，還能將已發賣的寺田重新收歸官府。萬曆年間著名的惠州籍官員葉春及(1532-1595)在一篇記提到當時惠州一座廢寺的寺田問題：

[參將]侯公[繼高]慮無以供僧，先是，城西桂林有永興寺廢，遺田若干，覈之。於是指揮張之卿歸三台石田，歲租四石；編民莫迴歸烏坭坑田塘一頃二十一畝，歲租八十四石，二十倍之；莫速歸田塘一十一畝，歲租二十石，四倍於張之卿；卒伍康廷科歸路頭園田，歲租二石，減元卿之半。歲入共一百一十石，書於海豐之版而歸其食於僧。¹¹⁸

參將侯繼高，在隆慶六年(1572)以後到萬曆六年(1578)間任分守惠州等處海防參將，可見此記大約作於萬曆初年。¹¹⁹從本篇記載來看，永興

¹¹⁶ 蘇起元，《(崇禎)博羅縣志》，卷5，葉春及，〈復龍華陳孝女祀田記〉，頁227-228。

¹¹⁷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卷446，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頁7604；卷513，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壬午，頁8417。

¹¹⁸ 葉春及，〈新建碣石玄武山記〉，收入譚棣華等編著，《廣東碑刻集》，頁871。又參見葉春及，《石洞集》，卷15，〈碣石衛玄武山記〉，頁693-694。

¹¹⁹ 萬曆《廣東通志》記載侯繼高是隆慶六年任廣東都指揮僉事，《明神宗實錄》提到萬曆六年十月侯繼高從惠州海防參將陞為潮漳等處副總兵。參郭棐修，《(萬曆)廣東通志》，卷10，〈秩官〉，頁262；顧秉謙等撰，《明神宗實錄》，卷80，萬曆六年十月甲申，頁1711。

寺此前已被廢，寺田早已不存，侯繼高以恢復玄武山祭祀玄武的名義核査寺田去向，於是清出已被指揮、編民、卒伍等不同身份的人所控制的寺田，其歲租達 110 石。這些田產的擁有者大概不會欣然將田產交出，但該記也沒提到官府採取什麼方法拿到這些田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寺田並不是交還到僧人手中，而是登記在海豐縣的版籍(也許是指黃冊)之中，再由官府把租入撥給玄武山的僧人作為供養費用。

關於寺田的賦稅負擔問題，霍家計算，兩頃寶峰寺寺田要交納僧米 10 石 7 斗、虛稅糧 2 石 7 斗，負擔較重。霍家所承買此寺田的糧差負擔與民田相比如何？根據萬曆《廣東通志》，可以見到一二端倪。萬曆《廣東通志》記載廣州府賦稅情況時稱：「舊額，官職學院田惟南海有之，餘止官民僧道四者，豈其初制則然？乃今去其籍不可復跡矣。故列近則于後，冀為之損益云。」¹²⁰茲將該志廣州府南海等縣的田地科則數字列表如表 1，以作比較：¹²¹

表 1 萬曆《廣東通志》載廣州府各縣田地稅則(單位：升 / 畝)

縣分	上則官田塘	中則官田塘	下則官田塘	公職官田塘 贍軍慶寺灑 泉書院廣恩 館等官田塘	民田	僧道田地塘
南海縣	35	24	16	25.6	3	5
番禺縣	16.5	13	2	-	2.8	2.8
順德縣	0.9	0.9	0.9	-	1.7-4	-
東莞縣	0.47	0.46	0.44	-	1.5-2.8	-
新會縣	0.48	-	0.36	-	1.9-2.5	4.1
香山縣	0.63	0.63	-	-	1.7-2.1	-
增城縣	0.56	-	0.26	-	1-3	5

從表 1 來看，除了南海縣有「官職學院田」(可以看作是官田一類)以外，廣州府的田土基本分為官、民、僧道三類。其中，民田的科則基本都在 2-3 升 / 畝上下。而僧道田，除番禺縣及無數據的縣份，基本

¹²⁰ 郭棐修，《(萬曆)廣東通志》，卷 17，〈賦役〉，頁 411。

¹²¹ 郭棐修，《(萬曆)廣東通志》，卷 17，〈賦役〉，頁 412。

在 4-5 升 / 畝的範圍，大概是民田負擔的兩倍。官田的科則差異很大，其中南海、番禺兩個省城附廓縣的官田，以中則官田計算，是民田的 5-8 倍。而其他各縣，官田的稅則反而是民田的 1/4-1/2 而已，這可能由於各縣對不同性質的土地糧差有不同的折銀率的緣故。據此審視《石頭霍氏族譜》的記載，寶峰寺田的稅則平均是僧米 5.35 升 / 畝，虛稅糧 1.35 升 / 畝，與萬曆《廣東通志》的紀錄比較，可知寶峰寺田以僧道常住田的稅則計算，而非廢寺田。族譜說「糧差甚重」，則是相對民田而言。

至於那些入官的廢寺田，雖然沒有差徭的負擔，但其名義上的稅則更高。例如萬曆十一年(1583)南雄府保昌縣知縣汪一右在請求以南雄橋稅代納虛糧的請求中提到了官田與民田的差別：「蓋官田任人頂種，原無價值。如官抄箭田壹畝者，認糧壹斗柒升，如官發寺田壹畝者，認糧伍斗玖升，其每年每石止納糧銀貳錢捌分柒釐，絕無雜泛差(徭)」。¹²²汪一右提到，官田沒有價值，因為頂種之人只有租佃權而無田產權。此處「官發寺田」，應是指官府拿來發賣的寺田，其稅則是糧 5.5 斗，折銀為每畝繳銀 0.15785 兩，但沒有「雜泛差徭」。另一方面，民田每畝稅則大概是 3 升，折銀要比官田高得多，但總體糧差負擔還是比這些「官發寺田」要輕。¹²³

又如潮州府海陽縣開元寺，該寺田產包括常住田以及廢寺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打官司時，開元寺僧提到該寺「田地歷傳雖久，各有印冊古簿，並案卷審語呈明，印批疊疊可據。其餘田地則屬垂寺皇

¹²² 陳志儀修，《(乾隆)保昌縣志》，卷 4，〈田賦〉，頁 614。

¹²³ 乾隆《保昌縣志》沒有記載當時民田的折銀稅率，但萬曆二十七年由於加派虛稅糧，「重則田內每石增至一兩零六分」，以民田每畝科則 3 升折算，每畝須繳銀 0.03 兩，此外民田還有差役。見陳志儀修，《(乾隆)保昌縣志》，卷 4，〈田賦〉，頁 615-616。

業及師祖創置，並廢寺收入，附寄黃冊，垂載可考」。¹²⁴乾隆五年(1740)潮州府海陽知縣則提到，「寺田糧重租輕，除完糧外，合之官給口糧，僅足敷用」，又稱「原有田租，久為豪佃隱占」、「寺田已經充公，縣主止糧收租，遞年四季給僧口糧，共銀二百兩」。¹²⁵清代的整體社會情況與明代相比變化頗巨，在此不作展開。但可見這些已經被官府充公，仍記載於開元寺名下的常住田與廢寺田，在黃冊都有明確的登記，而且這些寺田被形容是「糧重租輕」。

就是在這一情勢下，霍韜之子霍與瑕擔心寶峰寺寺田的歸屬問題還會發生變更，於是另買簡村堡數十畝民田作為大宗祠的產業。霍與瑕透過「樽縮前租」的辦法，就能買到簡村堡數十畝田，說明雖有增價發賣的壓力以及當時寺田糧差較一般民田重，但寺田的租入仍足以用來重新購置數十畝民田。霍韜為其宗族留下的寶峰寺寺田，直到清嘉慶十五年(1810)才轉賣出去，據今存霍韜家族宗祠牆上的一塊碑記：

本宗嘗業向在西樵、金甌、大桐、九江等處，共稅壹百陸拾肆畝零，係六世祖文敏公送出，以為蒸嘗留祭之用。歷數百年收租奉祀無異。嗣因佃丁多有拖欠之事，紳老宗子集祠酌議，盡無移遠就近，似於即覓人轉受，得價銀壹千五百零五兩壹錢貳分……隨即置回本地業共叁拾玖畝陸分，共價銀壹千壹百陸拾貳兩貳錢零。……

嘉慶拾伍年二月日合族紳老宗子理事等仝立。¹²⁶

該碑提到文敏(即霍韜謚號)公所贈田土，其坐落位置皆在西樵山周邊，

¹²⁴ 康熙三十五年〈奉憲立碑〉，收入譚棣華等編著，《廣東碑刻集》，頁 225。

¹²⁵ 乾隆五年〈海陽縣正堂為造繳租冊籲恩勒石〉，收入譚棣華等編著，《廣東碑刻集》，頁 228-229。

¹²⁶ 該碑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石頭村霍氏家廟內，筆者 2014 年 10 月 12 日訪碑。

而寶峰寺正位於西樵山上，所以這些「嘗業」無疑就是寶峰寺寺田，只不過面積從之前的 2 頃(200 畝)減少到 164 畝。由此可見，從嘉靖初年霍韜買入寶峰寺田，到嘉靖年間兩次發賣增價，一直到三百年後的清代中葉，霍氏仍保有這些田產，霍與瑕所擔憂的「終有更變」並未發生。只是到了嘉慶年間，才以佃丁拖欠的理由轉賣出去，購置回本地田 39.6 畝。假如這些田土的「畝」有相同計量意義的話，寺田的地價大約為 9.2 兩 / 畝，而本地田則需要 29.3 兩 / 畝。霍氏家族寧願選擇面積少得多的本地田，而放棄已經保有三百年的寺田，碑記稱原因是「佃丁多有拖欠」，但或許與寺田的稅率也有關係。

嘉靖初期從寺觀轉移到勢家的大量田產，由於其特殊的寺田性，朝廷能以軍餉、大工等方式，繼續向已經賣出去的寺田買主增收田價，而且寺田的稅率也比一般民田為高。這些寺田即使轉移到了民戶手中，其性質仍屬於寺田，而非民田。因此，像霍韜這樣的士大夫即使最初購買寺田時能以低價買入，在嘉靖中期開始，也要面臨官府繼續追價的問題，像霍氏家族這樣能夠保有寺田將近三百年，大概算是很成功的。方志中記載了不少官府對寺田追價超出了買主的承受能力，而買主寧願將寺田退還歸官的例子。如崇禎年間清遠縣記錄先前廢寺田時就提到，「原經給帖各里排在官納價承買，管業多年。後因上司行文重複追價，致里排推出還官」。¹²⁷又如順德縣「祝釐習儀之所」的寶林寺，康熙十六年(1677)順德知縣時應泰提及，該寺原設田 233 畝，益以隆福寺田 165 畝，「歷年既久，勢家侵漁存畝，而僧稅視民田倍重。兵興徵求急，又質田應之，以至於盡，僅存虛稅，里胥迫呼接踵，僧去，寺無居人數百年」。¹²⁸從時應泰的描述來看，寶林寺的僧田屬

¹²⁷ 該條有「據舊志」的說明，按該志凡例，所據應該是崇禎九年(1636)清遠知縣孫麟所修縣志。陳丹葢修，《(康熙)清遠縣志》，卷 4，〈祀典〉，頁 35。

¹²⁸ 郭汝誠修，《(咸豐)順德縣志》，卷 16，〈寺觀〉，頁 393。

於常住田，其僧稅要較一般民田重，相應於田課加派時的負擔也更大，以致僧人將田抵押出去還不足以交納。

六、結語

明代寺田的性質及其賦役政策的變化，是已有研究中缺乏考慮的重要因素。梁方仲認為寺田屬於民田，但從本文的討論可知寺田不能簡單視為民田。洪武十五年「天下僧道常住田不許典賣」之令就可見寺田無法像普通民田那樣買賣。而嘉靖中期將已賣出去的寺田奉勘合再次增價發賣，其在民田買賣中也不可能發生。在明代廣東官府眼中，寺院皆屬官府所掌控。寺院及其田產的本質仍屬「官有」。所以，官府可以在打擊淫祠時，把寺觀也列入打擊對象，並發賣其寺基與田產。這些變賣出去的寺基與田產，官府仍然保留了很大的處置權，甚至繼續增價發賣，這都基於寺院的「官地」性質。只是在現實環境中，官府能否控制寺院及其田產，則要視地方勢力的強弱而論。¹²⁹

透過對寺田性質及其賦役政策的梳理，以及明中葉廣東毀淫祠活動之後對寺田的處置，可以進一步了解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毀淫祠寺觀背後圍繞寺田產生的利益爭奪及賦役政策的變化。嘉靖初年魏校

¹²⁹ 如天啟六年潮州府的批文提到：「開元寺為從古祝聖道場，志載其基址廣闊，擬於府制，尺尺寸寸，罔非官地，官可得而主，僧可得而居，民不可得而據也。自中式葉微，沙門失守，喇豪盤據，漸不可制。」這段話很能反映明代後期官員對寺院性質的看法，官員認為開元寺屬於官地，所以應該由官府控制，「民」不能竊據。但在該寺「式微」的情況下，僧人要恢復舊寺，士紳要在此處設立鄉約、商賈要在邊圍建立鋪店、縣學生要以僧舍為文館，其中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官府一方面表示將拆毀寺內民房，另一方面又保留邊圍的商鋪民房來收稅。見天啟六年〈潮州府奉兩院並各司道批允勒石嚴示禁革碑記〉，收入譚棟華等編著，《廣東碑刻集》，頁222-224。

毀淫祠活動之後，圍繞著被毀淫祠寺觀田產的歸屬問題，廣東官府與地方權勢之家產生了激烈的爭奪與辯論。直到嘉靖十一年林富去職，以及龔大稔彈劾方獻夫、霍輅不被嘉靖皇帝接納，廣東地方權勢之家得以繼續保有寺田，但需要繳納田價充當軍餉。由於寺田的特殊性質，官府能對寺田施加更大的影響。嘉靖二十一年、嘉靖三十九年，朝廷分別以軍餉、大工之需為由，對已經賣出去的寺田再次增價發賣，與此同時，寺田也要負擔比一般民田更重的糧差。

明代後期的情況稍有不同，卜正民的研究指出，從萬曆到清初數十年間，是宋代以後寺院興建最活躍的時期，不僅如此，還是「士紳從事與寺院相關的活動的最偉大時期」。¹³⁰士大夫在寺院的日常活動和捐贈問題上有非常大的話語權。¹³¹在廣東，萬曆以後興修寺院的活動確實十分活躍，也是在士大夫積極參與下進行的，寺院的活動受制於地方士大夫的參與和捐贈，而且晚明珠江三角洲的寺院不再擁有明前期的龐大田產。

重新審視明中葉珠江三角洲地區毀淫祠活動，則其意義不僅僅體現在禮儀變革上。從禮儀變革角度來看，魏校的毀淫祠之舉得到了珠江三角洲士大夫階層的支援，不僅是基於共同的儒學價值觀，而且與當地士大夫透過挑戰民間信仰和佛教力量來擴展自身影響力密切相關。從經濟與賦役角度來看，明中葉在毀淫祠名義下對佛寺的打擊，尤其對寺田的變賣，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佛教力量失去最為重要的經濟支撐。嘉靖以後，就看不到成化《廣州志》中如此大規模佛寺田產的紀錄。廣東珠江三角洲士大夫階層和新興的宗族不僅擠壓了佛教在民間的信仰空間，而且將大量寺產轉移為士大夫和宗族的產業，儘

¹³⁰ 卜正民，《為權力祈禱》，頁 14。

¹³¹ 卜正民，《為權力祈禱》，頁 185-311。

管這些寺田仍然有著與一般民田不同的性質與賦役政策，而且帶來「增價發賣」的新問題。由此觀之，明中葉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毀淫祠寺觀活動，伴隨著宗族建設的興起，改造了此地的社會與歷史。

(本文於 2015 年 1 月 27 日收稿；2015 年 9 月 21 日通過刊登)

*作者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陳海立、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申斌、三位匿名審稿人以及編輯委員會對拙文所提出的寶貴意見和修改建議。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石頭霍氏族譜》，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本，廣州：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 《南海丹桂方譜》，民國十五年(1926)刻本，廣州：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 孔興璉修，《(康熙)番禺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18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方豪，《棠陵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影印。
-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王命璿修，《(萬曆)新會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37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朱學熙修，《(崇禎)南海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10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余保純，《(道光)直隸南雄州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第 2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吳中、高橙修，《(成化)廣州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1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李東陽等纂，《(正德)大明會典》，東京：汲古書院，1989，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刊本影印。
- 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
- 姚鏌，《東泉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嘉靖刻清修本影印。
- 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居正等撰，《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郭汝誠修，《(咸豐)順德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17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郭棐，《粵大記》，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 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

版社，1990。

郭棻修，《(萬曆)廣東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9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影印。

陳丹蓋修，《(康熙)清遠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41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陳志儀修，《(乾隆)保昌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第 4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

黃佐，《泰泉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十卷本，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

黃佐修，《(嘉靖)廣州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廣州府部》，第 1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黃佐修，《(嘉靖)廣東通志》，廣州：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謄印，1997。

楊士奇等撰，《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

葉春及，《石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葛寅亮，《金陵梵剎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萬曆三十五年(1607)南京僧錄司刻天啟七年增補本影印。

賈洛英修，《(康熙)新會縣志》，廣州府部第 37 冊，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歐陽保等修，《(萬曆)雷州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第 1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霍韜，《石頭錄》，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4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霍韜，《渭厓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9-70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萬曆四年(1576)刻本影印。

戴璟修，《(嘉靖)廣東通志初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魏校，《莊渠遺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譚棟華等編著，《廣東碑刻集》，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蘇起元，《(崇禎)博羅縣志》，收入《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 8 冊，廣州：

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

顧光撰，《〈乾隆〉光孝寺志》，收入《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3輯，第3冊，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

顧秉謙等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

二、近人論著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張華譯，《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井上徹，〈魏校的搗毀淫祠令研究——廣東民間信仰與儒教〉，《史林》，2003：2(上海，2003)，頁41-51。

任建敏，《從「理學名山」到「文翰樵山」——十六世紀西樵山歷史變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伍丹戈，〈明代徭役的優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3(廈門，1983)，頁40-54。

何淑宜，〈以禮化俗——晚明士紳的喪俗改革思想及其實踐〉，《新史學》，11：3(臺北，2000)，頁49-100。

周齊，〈明朝諸帝的佛教認知與政治文化環境〉，《法源》，2001：19(北京，2001)，頁273-293。

林楓，〈福建寺田充餉淺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4(廈門，1998)，頁48-53。

竺沙雅章，〈明代寺田の賦役について〉，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頁487-512。

科大衛(David Faure)著，卜永堅譯，《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科大衛，〈明嘉靖初年廣東提學魏校毀「淫祠」之前因後果及其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收入周天游主編，《地域社會與傳統中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頁129-134。

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2003：2(廣州，2003)，頁1-20。

科大衛，〈國家與禮儀——宋至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5(廣州，1999)，頁65-72。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

- 基礎》，《歷史研究》，2000：3(北京，2000)，頁 3-14。
- 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歷史研究》，1986：2(北京，1986)，頁 161-174。
- 梁方仲，〈《明史·食貨志》第一卷箋證(續三)〉，《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2(北京，1981)，頁 71-83。
-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傅貴九，〈明清寺田淺析〉，《中國農史》，1992：1(南京：1992)，頁 20-28、35。
-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1，(北京，2003)，頁 54-64。
- 鄧國亮，〈明代中葉「藤峽三征」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7。
- 濱島敦俊，〈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冊，東京：汲古書院，1990 年，頁 1325-1358。
- 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2001。
- 羅東陽，〈從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權與民間社會〉，《求是學刊》，33：1(哈爾濱，2006)，頁 131-138。

三、網路資料

- 湛若水，《甘泉先生續編大全》，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萬曆二十三年(1595)修補本點校，收入「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hanji.sinica.edu.tw>。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4 日。

The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and Temple Land Disposition in Guangdong in Mid-Ming China

Jianmin R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and its impact in mid-Ming Guangdo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emple land taxes and corvee to highlight the changes that stemmed from the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in mid-Ming Guangdong, an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Guangdong local government and literati class hidden under the name of destroying illegal temples. After Wei Xiao's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most of the large temples with thousands of acres of farmland no longer exis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owever, the status of the farmland released from temples did not change to the civilian land. Temple land was assessed for taxes and corvee differently from civilian land, and even if the temple land was sold, the government still had some control over it. Even though buyers paid the proper price to purchase temple land, officials were still able to ask for a higher price in the name of military supplies or palace construction costs. In Guangdong, especiall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Jiajing reign was a critical period in the transition of Guangdong temple land, and Wei Xiao's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 land was just the start of this transition. Thereafter,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wnership of temple land and on increasing prices in the early Jiajing, as well as taxes and corvee on temple land in the mid-Jiajing period, changed the nature of tax and corvee policies regarding "temple land" in Guangdong.

Keywords: Guangdong,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temple land, taxes and corvee, increasing prices